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

蔡 雨 菁

摘　要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中所出现的失误，又助长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大革命　陈独秀　右倾投降错误　共产国际

深入研究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首先应研究中共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方针、政策，尤其是研究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理论。同时，我们还需看到，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脱离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指导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具体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失误，也是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明确提出了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同时还提出了实现这个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的策略。1922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在杭州又召开了西湖会议。会议主要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中共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大革命初期和中期，中共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开展工农运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同时，为北伐战争的发动，在舆论和组织方面作了许多准备工作，特别是叶挺独立团挺进湖南援唐，首揭北伐战争的序幕。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叶挺独立团所向披靡，威震全国。

但是，随着国民革命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工农革命力量的壮大，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为篡夺军权和党权，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由于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在同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中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蒋介石采取了“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①]的方针，使蒋

介石的反动气焰不但没被压倒，反而得到了发展，从而埋下了颠覆大革命的祸根。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比较复杂的客观历史原因，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早在五四前后，陈独秀由于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起了倡导、启蒙、推动作用，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陈独秀和一批中国先进分子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成为当时积极的、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建党的发起人。1920 下半年，陈独秀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学说》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宣传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肯定了改造中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主张。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中，陈独秀作为李大钊的援军进行援应，世界观发生了转变，但思想中仍掺夹着很多复杂的成分，尤其是他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其思想和政治态度中必然要拖着很长的资产阶级尾巴，他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就是这种思想状况的最明显的反映，也是他世界观转变不彻底的突出标志，同时也是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产生的一个主要根源。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是：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认识；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武装；不了解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不能坚决领导农民的斗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些错误，论其产生，有大量的主观因素，尤其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在 1920 年 11 月发表的《国庆纪念的价值》，1923 年 4 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6 年 9 月写的《我们现在为什么斗争》等文章中，都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甚至到那时，共产党人也不与国民党左派争领导权。有了这种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就自然是处处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从主观方面检查，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大革命的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从客观上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又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密切联系。

1923 年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②]；革命的前途是：“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③]又说：“无产阶级明明知道此种国民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机会。”对农民运动的前途，他认为“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农业的资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④]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国民革命”就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国民革命”毫无疑问地应建立资产阶级共

和国；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这些对革命前途方向的错误认识，决定了他在具体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然而，陈独秀这种轻视无产阶级的作用，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以及重视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又有密切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在中共党内的反映。

1922年冬，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后，带回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实现国共合作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其中存在着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轻视共产党和夸大资产阶级作用、重视国民党等问题。决议指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又说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⑤]。这些思想与国际代表马林和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中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中共三大接受了这些观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⑥]

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理论上是比较明确的。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及附加议案指出：这些地区的革命“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的”，尽管这些地区的革命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按照“小资产阶级改良项目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⑦]。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要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一正确思想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实施。

首先，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一方面强调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指出“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⑧]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不适当地夸大了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未能正确处理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尤其在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成后，共产党如何通过党内合作壮大自己，孤立、削弱直至清除统一战线中的右派势力，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以前没有具体明确的指示。在长时期内，共产国际明显地表现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甚至一度认为，在中国领导工人运动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他们还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援助国民党，而对共产党要求给予的必要援助持消极态度，不敢放手发展共产党和工农武装。“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向国际代表提出，在苏联援助蒋介石的枪械中，匀出五千支武器给广东农民，遭到国际代表的拒绝，理由是怕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搞国民党。

从国民党二大，到“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突出表现，而这些错误的出现，又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有直接关系。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激化，并与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交织在一起。国民党内部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坚持国共合作；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制造分裂，大肆攻击广东国民党。蒋介石由于在孙中山被困永丰舰时表示与孙中山共

存亡而得到特殊信任，后被派往苏联考察军事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1925 年在东征中击溃了陈炯明的反扑和杨希闵、刘振寰叛乱后，更加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廖仲恺被暗杀后，他乘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军队和政府中的地位。蒋介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采取种种阴谋手段独揽军政大权，为反苏反共做准备。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寻衅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利用这个事件公然要把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遣送回国，提出任党代表者应有相当资格，跨党党员不宜担任。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鲍罗庭不在中国，当时在广州主持苏联顾问团工作的布勃洛夫等表示不同意反击，这说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事实上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态度。4 月 29 日鲍罗庭回到广州，首先拜访了蒋介石，并多次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达成三项“君子协定”，而对“中山舰事件”未表示一点不满。这使蒋介石更加有了公开排挤共产党的借口，为其后来“整理党务案”埋下了伏笔。

1926 年 5 月 25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书》，承认“整理党务案”为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⑨]。这时，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重要职务者纷纷辞职，国民党中央人事发生大幅度变动，蒋介石乘机窃取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等要职，接着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加之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也实行退让，致使蒋介石实现了独揽党、政、军大权的野心，为其最后背叛革命打下了基础。对国民党右派的这些让步，当时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1926 年 12 月 16 日《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中说：“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⑩]陈独秀以及苏联顾问在实际工作中是努力贯彻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革命风暴席卷南部半个中国。由于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人对北伐认识不足，苏联顾问鲍罗庭对蒋介石利用北伐估计不足，致使蒋介石专横跋扈，独揽大权，有计划地逐步控制了北伐军。此时，蒋介石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苏联顾问鲍罗庭虽也通过一些措施对他加以限制，但由于蒋介石反革命时机日趋成熟，而共产国际、苏联顾问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一些人对蒋介石叛变又缺乏任何准备，因此，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发生后，中共遭受惨重损失。

1927 年 4 月 5 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这表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已完全公开。这一时期陈独秀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先对蒋介石的叛变丧失警惕，造成“四一二”的惨败；继而又对汪精卫存有幻想，为了与汪精卫联合，不惜限制工农运动，从而造成“七一五”的惨败。这些也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

1927 年 3 月 6 日蒋介石在江西已经开始屠杀共产党，公开反共。可是 3 月 16 日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却说蒋介石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四一二”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的上空，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相继在湖北、湖南叛变，汪精卫也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谈，达成谅解，公开叛变革命。这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为了保存自己而奋起反击。但事实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一样，放弃了斗争。虽然共产国际曾发出“五月指示”，但是“五月指示”是有先决条件的。《共产国

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就其主要倾向来看，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这说明共产国际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仍是同汪精卫国民党集团的关系问题。为了取信于汪精卫，国际代表罗易甚至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

中共五大后，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可见，在革命紧急关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同陈独秀一样对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的认识不足，作了错误估计，采取了迁就、退让、盲目依从的态度，丧失警惕放弃斗争，终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忽视甚至放弃对军队的领导，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武装。这些错误虽然表现了陈独秀本人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但也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政策和具体指导思想有关。

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在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就已充分表现出来。到大革命时期进而发展到行动上以武装援助国民党，而不发展共产党的独立武装。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国际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使蒋介石敢于制造"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和北伐军缺乏正确的估量和认识。北伐战争前夕，提出"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认为华北的冯玉祥部队"和广州军一起成为建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军的基础"[12]。可以看出，北伐战争前后，共产国际没有提出过要建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上，仍然没有把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提上议事日程。这说明，共产国际对充分利用国共合作有利条件，合法地发展在中共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认识不清，同时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意识到共产党应建立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直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后，苏联顾问鲍罗庭等人还是没有认识到要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是企图依靠军阀挽回时局。

在农民土地问题上，陈独秀长时期内不能满足农民土地的要求，当汪精卫公开反对、镇压工农运动时，陈独秀从他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导思想出发，害怕得罪资产阶级，破裂统一战线，对土地问题未能严肃对待，而随着国民党的意见转，使土地革命不能进行，甚至指责和制止已发展起来的工农运动，结果使革命失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是，陈独秀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不仅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指示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分不开。

北伐之前，共产国际提出过土地革命的问题，但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高涨的农民运动的形势。到了1926年10月，湖南、湖北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地主和土豪劣绅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是，共产国际对此却未给予具体的指导。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把中国问题列为议事中心，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当前"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目前的中国形势下，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13]这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策的一次重大发展。

但是，会议所提出的土地革命也是不明确的。就在这个《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批评了要抛弃国民党的想法，“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⑭在他们看来，中国土地革命可以在国共继续合作、没有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由武汉国民政府来领导进行。而事实证明，没有革命的工农武装，没有强有力的工农政权，土地革命是无法进行的。由于共产国际当时提出的关于土地革命的政策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所以在研究具体如何实现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国际代表间及中共党内同志间曾有过激烈争论，陈独秀动摇于两个国际代表之间，使中共丧失了革命良机。

以上情况说明，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苏联顾问对中国革命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缺乏深刻地分析和正确地认识，尤其在国共合作中如何保持中共的独立性，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发展共产党的独立武装，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右的指导错误。加之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固然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还应从更深的层次注意到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之间的关系。

---

①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24页。

②③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转引自薛汉伟等：《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0—121页。

④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转引自薛汉伟等：《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0—121页。

⑤ 《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76—77页。

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集》（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252页。

⑦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同⑤，第27页。

⑧ 《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同⑤，第38页。

⑨ 《致国民党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511页。

⑩⑫⑬⑭ 《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同⑤，第283、136—137、279、282页。

⑪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同⑤，第324页。

（责任编辑　匡　四）